

冼為鏗 著

談



濠海叢刊

吳志良主編



澳門基金會 出版

冼為鏗 著

談文字說古今二集

李鵬蕭題



澳門基金會出版

一九九四年八月

吳志良 主編

濠海叢刊

談文字說古今二集

作 者：冼為鏗

叢刊題字：錢君匋

封面題字：李鵬翥

副 主 編：馮少榮

執行編輯：呂平義

助理編輯：姚翠玲

出 版：澳門基金會

排 版：廣東省江門市江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 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 價：澳門幣60元

ISBN-972-8147-12-0

沙漠與綠洲

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承，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

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

吳志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

序

李成俊

《談文字說古今》第二集是浣爲鏗(思放)兄繼第一集後，整理近年以語文爲主的論著。集內很多文章我都在報刊上發表時拜讀過，先前水過鴨背，囫圇吞棗，如今重讀一遍，被其特有的魅力所吸引，獲益良多，深悔讀書報不認真是一大浪費和損失。

自鴉片戰爭失敗，中國積弱以來，漢字的命運不斷受到挑戰。“五四”後，不少權威學者都認爲“漢字不是大衆文化”。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先生甚至作出了“漢字不廢，中國必亡”的宣判。主張中國要改變落後面貌，方塊漢字必須徹底改成拼音文字，因而有“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漢語拼音方案”以及後來強調漢字要朝拉丁化的方向發展。

然而實踐證明，被數以十億人口使用了幾千年的漢字，具強大的生命力，不但不能廢，而且還要發揚光大！

漢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凝聚着中華民族的全部文化。常用漢字約三、四千個，用這三、四千個字可以組成變化無窮的詞。外國文字儘管有字母少的好處，但人們必須記熟由這些字母組成的幾千個單詞。隨着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新的詞匯陸續增加，其記憶量實際比漢字還多，漢字輸入電子計算機，速度較外文方便快捷。應該說，漢字是最好的大衆文化，魯迅當年的說法有時代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性。

漢字的演變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課題。作者對文字的考釋，常常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掌握了漢字象形而又“聲、韻”結合的優點，從語義、語匯上開拓了新的研究途徑。一千多年前，中國北方契丹人也創造過一種特殊的表音文字，有大字、小字兩種。根據七十年來出土的文字統計，已知契丹大字有一千六百多個；小字有三百九十個左右。唐武則天“無字碑”上的《大金皇帝都統經略郎君行記》一文，就是用漢文和契丹文的小字對譯的。還有我國少數民族納西的東巴文，雖然包括了一些形聲字，也使用同音假借，但基本上是象形表意，比較簡單和原始，它的構造與漢族甲骨文有某些相似之處。目前收集整理出來的單字共一千三百多個，可惜都因為民族的消失或衰落，其文字早已瀕臨湮滅。

漢語文是世界上最明確而又簡短的語文，有人以此視為漢語文的落後，其實是片面的不科學的看法。明確簡短正是漢語文優越的標誌，也是世界上各種語文的進步的必由之路。由於漢字輸入電子計算機的成功，二十一世紀將是漢字發揮威力的新世紀。

我贊成年青人讀一點古書，增加多一些成語知識。作者對日常易犯的差錯，如“利市”誤作“利是”，“冥壽”誤作“明壽”，“搬遷啓事”誤作“搬遷啓示”，“休戚相關”誤作“憂戚相關”，“束手無策”誤作“措手無策”，“眼神渙散”誤作“眼神煥散”，“尸位素餐”誤作“屍位素餐”等，都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博古通今的糾正。港澳報刊上特別是廣告還常誤“女士”為“女仕”、“批准”為“批準”、“候補”為“後補”、“贍養”為“瞻養”等，可見校對是一項難度頗高的工作。

作者指出“運用成語應力求準確”，我有同感。記得報社編輯部收過一條電訊稿，頌揚中國女子運動員的成績超卓是“紅

杏出牆”，用詞不當，爲之震駭。不料今春在北京讀到一份大報及其海外版，竟將綜合報道中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對外活動，冠以大字標題“兩枝紅杏出牆來”，接連還有一些報刊將“紅杏出牆”視作褒語，不知道“紅杏出牆”是形容妻子背着丈夫與別人通姦之意，良可浩嘆。

類似這樣誤用成語，時有所見。我曾在國內參觀一間工廠，發現佈告架上貼着球隊比賽的消息，結尾是“誰死鹿手，未可逆料”，幾乎忍俊不禁。“鹿死誰手”不應顛倒爲“誰死鹿手”。古人以鹿喻天下，《六韜》載：“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漢書》也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句。“鹿死誰手”謂未悉“天下”落入誰人之手。

有些成語與複合詞中，往往一字之差就會造成語法、語意和詞義上的錯誤。如京劇《打漁殺家》，應作《打魚殺家》，現已習非成是。《易經》云：“以佃以漁”。佃是耕田，漁是捕魚。“打漁”豈不成爲“打打魚”？又如“按步就班”應作“按部就班”。源自陸機《文選》：“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部”和“班”是對稱字，不宜更易，誤爲“按步就班”，實屬大謬。

我曾收過一位國內講師的信，首句“敬稟者”，結語“敬請金安”，下署“叩”，將對父母的稱謂格式用於對朋友。我以爲倘使沒有進修過尺牘之類，還是寫語體文穩妥。

“否定舊傳統，打倒‘孔家店’”，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一系列反思。作者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本着“簡單化不可取”的態度，對儒學剖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孔子思想有兩重性，他的思想是兩千多年歷代封建王朝統治階級的精神支柱。他維護宗法社會，三年出喪守孝，輕視勞動和婦女等，都是消極的東西。但他好學、博學、多聞，一定程度上帶有遠見的智慧。他提倡教育，尊師重道，表示知過必改，在品德修養上也有許

多寶貴的見解。他重人道，輕鬼神，認為人世間的事情都是人做的；人可以不依賴鬼神，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些思想不僅在當時，即使在現在也有進步意義。

當今中國，由於市場經濟衝擊，拜金主義成風，倫理道德有所滑坡，已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通過對儒學研究，通過為學做人的基本原理的詮釋，將促進人們對人性、人道和價值觀念的反思，使倫理意識重新融入社會，也可以說是振興中華的關鍵之一。

作者冼為鏗(思放)兄同我相交近半個世紀，他早年與一群青年學生一道發起組織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又出任過多年中華教育會負責人，先後擔當全國人大和廣東省人大代表。他嗜讀書，好學不倦，治學嚴謹，對文史尤有專長。《談文字說古今》第二集旁徵博引，論不虛發，分析精審，辨偽求真，觀瀾索源，深入淺出，貫串古今釋義，體現理論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的統一。

《論語·子罕》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憑空猜測，不絕對肯定，不拘泥固執，不唯獨是，這“四不”，正是我概括《談文字說古今》第二集的寫照。希望作者繼續努力，《談文字說古今》的第三、第四……集源源問世。

序

何九盈

去年九月，我應聘來澳門大學任教，為開設“漢語文字學”一課，向圖書館借閱了一批參考書，其中也有冼為鏗先生的大著《談文字說古今》。我仔細拜讀了這部長達二百頁的論文集，讚佩之情，油然而生。文字樸實無華，議論證據古今，片言隻語之爭，一音一義之辯，反覆求證，必歸於當而後止。在這個號稱東方蒙特卡羅的澳氹海隅，有人以辯證唯物之利器，致力於實事求是之學，弘揚樸學精神，焉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同樣，我對參與爭鳴的其他學人也表示相當的敬意。只有通過爭鳴，澳門地區的語言文字之學乃至整個學術領域，才會出人才，出成果，出現真正的繁榮局面。

讀其書，儀其為人，這是人之常情。嗣後，我和友人祥徽一起與冼先生見過幾次，所談無非學問二字。人如其文，樸實儒雅，沒有半點俗氣，的是學者風格。

最近，冼先生又將出版第二本論文集。承先生不棄，囑予閱而序之。這使我想起了一則古訓：“人之患在好為人序。”何況，先生聲名播澳海，於學無所不窺，予何敢為先生序。然而，作為先睹此集的讀者，豈能默而無言，姑妄名之曰“序”，亦惟畧叙一己之心得而已。

我們中國的學術傳統，歷來就主張文章要於世有用、有益。所謂“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字無補。”“文章合

爲時而著，詩歌合爲時而作。”“文須有益於天下。”此類名言，衆所熟知。綜觀洗先生的文章，無一篇不是爲解決實際問題而作。不論大題小題，長篇短論，其有用有益則一也，茲列舉數端，以證吾言之不謬。

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學術思想、文化觀念，發生了具有深刻意義的重大轉折。在這個轉折過程中，洗先生以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極其清醒的頭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面反思。肯定了傳統文化中“重視人生，關心現實的精神”，“重視合群”的精神，“講求道德的精神”，而對“以三綱五常爲核心的封建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動謬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保守主義，則持徹底否定的態度。曾經有不少人“認爲儒家傳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取得經濟奇跡的動力”。洗先生指出：“這是誇大，也是誤會，是不符合事實的。”“日本的成功，正是克服了儒家傳統的消極影響獲致的。”在《新儒學與現代化》一文中，洗先生進一步斷言：“儒學與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我也同樣認爲那些至今還想乞求儒學以振興中華的人，不論主觀願望是多麼善良美好，事實上是既不瞭解儒學又不瞭解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情。我不是說儒學一無是處，而是說儒學是不能對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起指導作用的。

漢字問題，是十餘年來學術界又一熱門話題。《漢字有很強的凝聚力》、《漢字的優越性》、《漢字改革問題隨想》、《談談漢字的簡化》等文，較爲全面地闡述了著者對漢字問題的基本看法，著者也對港澳兩地堅持沿用繁體字的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這些文章既有學術價值，又有明顯的實際意義。它有利於澳門同胞從認識上統一對漢字的看法，加深對中國政府關於漢字政策法規的理解。

至於漢字的壽命問題，也就是漢字的前途問題，也就是漢字能否實行拼音化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著者的論述是很有說服力的。“太多的同音字，這實在是漢字實行拼音化的難以逾越的關卡”，據我所知，最早用同音字多為理由反對拼音化的是明末來華的西洋傳教士金尼閣（此人與澳門還有點關係）。而那些主張把漢字改為拼音文字的人，卻說反對者是得了“同音恐懼症”，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是不可以實行拼音文字的。理論上儘管說得通，事實上同音字的區分還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看來，這個問題只能由子孫後代來解決了，只能讓歷史來作結論了。因為未來的科學技術如何發展，書寫工具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發展和變化對漢字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都是難以預料的。不過，在現階段，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漢字的合法地位必須鞏固，不可動搖。

書中的關於漢字析字法問題，我只想引用書中的一段原文，以證明著者在學術問題上的原則精神：

“我認為對於漢字的解釋，應該抱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讀者看來感到合理，站得住腳。無論甚麼析字法都要避免任意馳騁自己的想像力，把明白易懂的字解釋得曲折玄妙，看起來似乎新奇可喜，其實是穿鑿附會，令人生疑。”（46頁）

“我認為胡樸安先生的意見是非常中肯的，他列舉王安石所鬧的笑話，也值得我們警惕。”（37頁）

這些話是常識，也是真理，真理往往就寓於常識之中。凡是接觸過文字學的人都知道，東漢許慎就批評過“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之類的析字法，批評這樣的析字“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我們比許慎時代所能見到的古文字材料要古得多，我們能見

到商代的甲骨文，又能見到大量的金文，這些古文材料都是“析字”的重要依據。今文派據隸書以析字，已是謬誤百出；若據楷書以析字，這就更加難以索求本原了。

在語言文字運用問題上，冼先生更是一位非常認真，異常執着的人，他隨時隨地都在關注、留意這個問題。從報紙、電視臺、辭書到期刊、廣告、標語，乃至學生的朗誦比賽，商店門口貼的告白，凡有音讀不正，用字訛誤，一經發現，便滿腔熱情，匡之正之。我們應當感謝冼先生在這方面付出的辛勤勞動，他稱得上是澳門語文園地的“保健醫生”，為澳門地區漢語言文字的健康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冼先生學貫古今，對古書中的不少疑難問題，也有深入研究。如論證“欲加之罪”的“加”字為古義，當解為“誣捏”“誣枉”。又如《何謂‘風馬牛不相及’？》、《“束脩”應怎樣解釋？》等文，對這兩個古今爭論不休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清代洪亮吉也討論過“束脩”問題，其結論也頗有意義，不知冼先生以為然否？

顧炎武曾說：“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樂道人之善”談何容易！“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於今為烈。冼先生則不然。他不惟勇於匡謬正俗，也嚴於解剖自己，更樂於稱道別人的優點。他是一個思想境界很高的人。《談文字說古今》一書中，有一篇《到處逢人說項斯》，文章說：“楊敬之這種‘不解藏人善’的精神，真是值得大書特書。”在我看來，冼先生就頗有楊敬之的氣度。他寫過《〈老子全譯〉讀後感》，“誠意地向讀者推薦這本好書”。還向澳門讀者熱誠推介葛曉音的《唐宋散文》，熱誠推介

周強的《三國演義考評》，熱誠推薦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還介紹過李宗桂的《中國文化概論》，介紹過馮友蘭的一篇遺作，讚揚“馮老個人獨特的見解”。他也對王寧的《漢字的優化與繁簡字》“特別感興趣”，讚揚此文“可讀性高，極具吸引力，……富於邏輯性。”他也推崇蔣紹愚主張將“古今字”改稱為本原字和區別字的意見，“覺得……很好”，“值得推廣使用。”至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寫的《談談申小龍現象》，更表現了冼先生獎掖後學的長者風度。文章結尾寫道：“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能否合理地找出漢語語言的規律性，確立他的理論體系，并且獲得語言學界的公認，現在還言之過早。不過，申小龍作為一位闖將，獨樹一幟在語言學界中衝鋒陷陣，引起轟動，并指出一個研究方向，他的功勞是不容抹煞的。”新生力量往往夭折於“捧殺”和“棒殺”。冼先生這些話，有冷靜的分析，也有熱情的鼓勵，恰到好處。

我讀完了冼先生的兩本論文集，在心靈上頗受感動。他并不是學術研究的專業人員，他只能利用公務之餘，讀書，寫作，而他所研究的領域、研究的成果，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不可等閒視之。於是我猜想，他一定是從青年時代起，就熱愛知識，養成了良好的讀書習慣。博聞強記，學有根柢。另外，他一定是把公務之外的時間都用在讀書、研究、寫作上了。累累碩果，就是明證。還有，他那種鍥而不舍的鑽研精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請讀一讀《曾三顏四》這篇小文章吧。這篇不滿一千字的小文章，是花了幾年的時間才寫成的呢！一九八〇年旅行蘇州時，看到一副對聯：“禹寸陶分，曾三顏四”，還有一條幅：“顏苦孔之卓。”何謂“顏四”？何謂“顏苦孔之卓”？冼先生登時“陷入冥思苦想之中，對於美麗如畫的景色也無心欣賞了。”直到一九八六年，才鑽通“顏苦孔子之卓”的含義，後來又解開了

“顏四”之謎。作者并未沾沾自喜，文章的結尾卻從大處着眼，批評“類似‘曾三顏四’的句子，簡直就像謎語一般，使人煞費思量，實在很不好。所以白話文的取代古文，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舉這個例子，也是提倡一種精神，一種“着迷”的精神，而不是要人們都去鑽研“曾三顏四”之類的問題。

澳門地區正處在過渡時期，由於歷史的原因，語言文字問題頗為複雜。但漢語和漢字地位的提高，已是大勢所趨，而如何準確地運用漢語、漢字，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語文工作者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此其時也。我相信，冼先生這本論文集子的問世，對澳門地區的語文研究以及整個人文學科的研究，以及與內地的學術溝通，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五日於澳門氹仔島

目 錄

沙漠與綠洲	吳志良 (I)
序	李成俊 (I)
序	何九盈 (I)
漢字有很強的凝聚力	(1)
漢字的優越性	
——常用字的集中性	(4)
漢字改革問題隨想	(7)
漢字能否拼音化?	(10)
談談漢字的簡化	(14)
簡化漢字和古今字	(16)
重視漢字的優化原則	
——《漢字的優化與繁簡字》讀後感	(19)
本原字和區別字	(22)
談談粵語的入聲	(25)
“我識你”和“我食你”	
——談談粵語的聲調	(27)
從“翔實”談到通假	(29)
通假趣談	(31)
假借和通假	(33)

答曾鳴先生	
——安子介的析字法讀後感	(35)
附錄：安子介的析字法	
——兼與思放先生商榷(曾鳴)	(38)
再答曾鳴先生	(43)
附錄：三點分歧	
——《答曾鳴先生》讀後(曾鳴)	(47)
“畫皮”和“閃鑠”	
——談談電視臺的語言文字	(53)
附錄：也說“畫皮”	
——與思放先生商榷(曾鳴)	(55)
再談“畫皮”	
——答曾鳴先生	(59)
習非成是難擺脫	
——再說《畫皮》	(62)
附錄：關於“畫皮”結構的看法(施其謀)	(64)
四談“畫皮”	(67)
學生朗誦比賽中聽到的誤讀	(70)
答曾鳴先生	
——關於“思”字的讀音	(73)
附錄：也說“憂思”的“思”	
——與思放先生商榷(曾鳴)	(76)
談談申小龍現象	(78)
“華髮”還是“花髮”?	(83)
“束脩”應怎樣解釋?	(85)
何謂“風馬牛不相及”?	(88)
有關“父”字的話題	(90)

談年說歲	(92)
“執牛耳”和“拾餘唾”	(94)
運用成語應力求準確	(96)
“原諒”和“寬恕”	(98)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談談“加”字的確解	(100)
甲骨文“王”字是甚麼形象	(102)
“小氣”和“小器”	(105)
從“夬夬”談起	(107)
“和而不流”與“和而不同”	(109)
“大運河”鬧的笑話	
——談談電視臺的語言文字	(111)
“將火升為三級”	
——談談電視臺的語言文字	(112)
芻議	(113)
湍、馳騁、冒頓的讀音	
——談談電視臺的語言文字	(115)
“絢麗”不應讀作“詢麗”	
——談談電視臺的語言文字	(117)
“每下愈況”和“每況愈下”	(118)
幾則文字的商榷	(120)
“冥壽”並非“明壽”	(122)
有邊讀邊不可取	(123)
“虛土”應為“虛土”	(125)
利是還是利市？	(127)
談談“蕩”和“盪”，“全”和“存”	(129)
此“制”不同彼“製”	(131)